

## 陶淵明的家世和品第

刘奕\*·崔智英\*\*

### <目次>

- |               |              |
|---------------|--------------|
| I. 问题的提出      | III. 职官制度的考察 |
| II. 《宋书》的史源考察 | IV. 结语       |

### I. 问题的提出

史实和作品考证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但“文献不足征也”，是研究者，特别是上古、中古文学研究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面对有限的材料，给予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辅证，常常会形成截然不同的观点，双方各持己见，颇让人有定论为难之感。其实，如果研究者跳出有限的直接材料和既定的视角，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如对史料进行文献梳理和史源分析，探究史料的可信度，如考察具有相对稳定形态的职官制度，在此基础上对史实加以更充分梳理，有些争论不休的问题，相信是可以辨明是非的。本论文即以陶渊明为例，尝试采用更综合的考证手段，对向来有争论的他的家世和他在九品中正制中的品第这两个相关联的问题做进一步探讨，希望获得较为明确的答案。

自《宋书·陶潜传》载渊明曾祖父是陶侃(259~334)以后，萧统(501~531)《陶渊明传》、《晋书》、《南史》陶传无不如是记载，向无异辞。到了

\* 上海大学 中文系 副教授

\*\* 大田大学 中文系 时间讲师

清代，却有很多学者提出质疑，又有不少学者回应质疑，坚持旧说。朱自清(1898~1948)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第六节中对这场争论有详述<sup>1)</sup>。这里先简述双方论点如下。

陶渊明有〈赠长沙公族祖〉一诗，清代全祖望(1705~1755)认为陶渊明称陶侃五世孙陶延寿为族祖，所以他应该是陶侃七世孙。王昶(1725~1806)从之。后姚莹(1785~1853)又以诗中“长沙公”为陶延寿之父绰之，而以为陶渊明是陶侃六世孙。全、姚二人只是质疑世系，阎若璩之子阎咏则更出新说，他因为诗中有“昭穆既远，已为路人”之语，认为陶渊明与陶延寿毫无亲属关系。他把诗序“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一句读为“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认为大司马指西汉的右司马陶舍，“大”为“右”之讹，然后提出陶渊明根本就不是陶侃的后人。后来孙志祖(1737~1801)、洪亮吉(1746~1809)、方东树(1772~1851)等都接受这一看法<sup>2)</sup>。朱自清在论文中引用了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三〈后萧陶氏重修族谱序〉，但忽略了洪氏在《晓读书斋杂录》中补充了更多证据。《杂录》初录卷上，洪亮吉提出《宋书·隐逸传》称陶淡是“太尉侃孙”，而记录陶渊明是“大司马侃曾孙”，他认为“义例不画一如此”。又其书四录卷上，洪氏又说颜延之(384~456)是陶渊明至交好友，但颜氏的〈陶徵士诔〉“叙渊明家世，只云‘南岳之幽居者也’，又云‘物尚孤生’，绝不及其先世。而三传皆云系出于侃。与其信异代之史臣，不若信生平之知己”<sup>3)</sup>。

而清代学者卢文弨(1717~1795)、钱大昕(1728~1804)、陶澍(1779~1839)，近人曾运乾(1884~1945)以及多数当代学者则主张旧说为可信。最有代表性的是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一〈跋陶渊明诗集〉批评阎咏云：“靖节为陶桓公曾孙，载于《晋》、《宋》二书及《南史》，千有余年，从无异

1) 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朱自清全集》第八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184-189页。

2) 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第184-187页。

3) [清]洪亮吉，《晓读书斋杂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155册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道光22年(1842)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586、638页。

议。近世山阳阎咏，乃据《赠长沙公诗序》‘昭穆既远，已为路人’二语，辨其非侃后，且谓渊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重。”之后，钱竹汀对阎咏之说做了详细地反驳。认为《命子》诗中陶渊明白述谱系非常清楚，陶侃、祖父、父亲，依次而下。如果陶渊明与陶侃无亲缘关系，“则《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勋德？攀援贵族，乡党自好者不为，靖节千秋高士，岂宜有此”。又认为陶氏家族向有萧墙之乱，才导致“昭穆既远，已为路人”的情况。针对阎咏“侃庐江郡寻阳人，渊明寻阳郡柴桑人，其址贯不同”的疑问，钱大昕解释说：“考寻阳郡即庐江所分，南渡后移于江南。士行生于郡未分之前，渊明生于侨立郡之后，史各据实书之，似异而仍同也。”此外，钱大昕提出了两个有力的证据，其一是从史料来源看，“六朝最重门第，百家之谱皆上于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齐武帝之世，亲见谱牒，故于本传书之。梁昭明太子作靖节传，不过承《宋书》旧文，而阎乃云始于昭明误读《命子》诗，则是《宋书》亦未寓目”。其二，阎咏认为“大司马”应是陶舍的“右司马”之误，而钱大昕从职官制度角度辨称：“汉初军营有左右司马，品秩最卑，不过中涓舍人之比。舍既位为列侯，不称侯而称右司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岂可以诬靖节乎？”文章的最后，潜研老人还说道：“颜延之作《靖节诔》，虽不叙先世，而其辞云‘韬此洪族，蔑彼名级’，藉非宰辅之胄，焉得洪族之称？此亦一证。”<sup>4)</sup>已经预先反驳了洪亮吉。洪稚存向以博雅称，居然对钱氏此文视而不见，颇令人费解。

朱自清在归纳正反双方意见后，表示更赞同信古一方，但持论谨慎，故结语云：“大抵此事只可存疑矣。”<sup>5)</sup>为什么“只可存疑”？看来钱大昕并未能彻底释疑解惑。而稍早吴士鉴(1868~1934)作《晋书斟注》，在陶渊明本传下引述阎咏、卢文弨、洪亮吉诸论，也说：“洪氏亦以为潜非侃之后人，与卢氏异。今并存之，以备考证。”<sup>6)</sup>也未有定论。之所以不能定论，恐怕与论辩双方同样依据陶渊明诗文，只是解读有异有关。陶集流传至今已近一千六百年，

4)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一《跋陶渊明诗集》，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第496-497页。

5) 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第189页。

6) 吴士鉴，《晋书斟注》卷九四，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1557页。

其中必有错讹而难以辨明。根据不能无疑的文本互相论难，要说服对方诚为不易。钱大昕虽然博辩，但也较多发挥陶诗陶文，从情理上立论。不过钱氏作为清代最杰出的考据学家，绝非浪得虚名，他从史料来源和职官制度两个角度加以论证，就跳出了陶渊明诗文的文本局限，大大加强了自己的说服力。这是因为一人之史传、单篇之诗文，容或有误，而考察史料的渊源，考证制度的样态和运作方式，则较易确实。今存最早的陶渊明传记是《宋书·隐逸传》中的《陶潜传》，如果沈约(441~513)撰《宋书》，羌无故实，反而多秽笔诬辞，那他的记载的可信度就低；反之，如果其史料有可靠可信的来源，那在证据不足时，宜采用信从的态度。从职官制度角度考虑，陶渊明在九品中正制中的品第，他的出仕和迁转，如无特别的理由成为特例，应符合他的家族地位，并与当时职官制度的运作相一致。因此从职官角度考察，其结论也相对确定。

正是受到钱大昕的启发，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更详细地讨论陶渊明的家世和品第问题。

## II. 《宋书》的史源考察

总体而言，陶渊明的早期传记有比较可靠的来源，如无强有力的证据，就否定这些早期记载，在文献上的是不太有说服力的。

中古作为门阀士族的时代，有一个对应的史学特色，是谱牒之学兴盛。唐代柳芳说：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己。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己。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sup>7)</sup>

7)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

周一良(1913~2001)总结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以前以后都不相同的有一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sup>8)</sup>除了谱牒，家传、家状等同样兴盛。郭锋甚至把家传、家谱、家状视为中古私家谱牒的三种不同形态<sup>9)</sup>。同时，私家谱牒常常包含详细的人物履历、生平记载，家谱与家传并没有严格的区分。陈爽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与家传的形式和功能上尚无后世那样严格的界定，家牒或谱传往往身兼家谱与家传两种功能，体例不纯，谱传不分，可能是汉魏六朝私谱的普遍特征。”<sup>10)</sup>

谱牒的用途，柳芳提到了两点，一是“别贵贱，分士庶”，二是“有司选举”。周一良同样强调这两个作用，即“作为任官参考或依据”，“用以辨别士庶，使应当服役的庶族不能冒充士族，逃避差役”<sup>11)</sup>。郑樵(1104~1162)《通志·士族略》则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sup>12)</sup>又加上了通婚姻这一条。总的来说，“现实政治赋予谱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辨别士庶，区分门第高下，这也是这一时期谱学的基本属性”<sup>13)</sup>。

谱学发达是基于现实政治功能的，因此魏晋以下政府也制定了相对应的制度，也有就是柳芳说的“谱有世官”，“有谱局，令史职皆具”。郑樵有更详细地说明：

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

1975，第5677页。

8)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5页。原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第2辑。

9) 郭锋，〈晋唐时期的谱牒修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第1期，第25-39页。

10)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第30页。

1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第399页。

12)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1页。

13)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3页。

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之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意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sup>14)</sup>

郑氏这话并非出于臆测，而是实有根据。《南齐书》卷五二〈文学·贾渊传〉载：

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sup>15)</sup>

又《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

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sup>16)</sup>

可知东晋太元中，朝廷已经编成天下士族谱，正本收藏在秘书监的秘阁，副本藏在尚书省左户曹。这部总谱，是贾弼“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即在已有的官谱和所收集私谱的基础上完成的。据〈贾渊传〉，可知贾弼之子、孙一直在补充完善该谱。

同时，朝廷也一直在征集私家家谱，于公可以补充完善谱牒，于私是私家谱牒可由此获得官方认可而取得权威性，显然双方都乐为之。陈爽发现了两个例证，一是元代汪松寿《汪氏渊源录》所保存的〈旧谱晋汪旭上谱表〉，作于晋成帝咸康二年(336)。一是民国版《龙游县志》卷三三《文征》所载《灵山徐氏谱》保存的刘宋徐琪〈应诏上谱状表〉<sup>17)</sup>。依据实例，陈爽总结六

14) 郑樵，《通志二十略》，第1页。

15) [梁]萧子显，《南齐书》(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7，第三册，第999页。

16) [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五册，第1459页。

17)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37-40页。

朝时私家谱牒呈报与审核的具体过程：“1. 由政府颁布诏令，征集诸家谱牒，其征集的范围主要是在朝为官的官宦世家。2. 各家族对各自保存的旧谱进行整理，按照一定的格式和要求申报，除叙述氏族由来之外，主要申报‘婚宦职状’，即是家族成员的官爵和婚姻状况，这种按照统一格式书写的谱牒被称为‘谱状’，呈报给‘知谱事’的主管官吏，多为尚书省的郎官。3. ‘知谱事’的主管官吏对谱状的内容进行审核，核实无误后，写出判语，呈报皇帝批准，而后存档备案。”<sup>18)</sup>这应该是南朝一般官宦家族都会做的事情。

各类公私谱籍，一直保存在朝廷中。《通典》卷三〈食货三〉保存有梁武帝时沈约所上请校勘谱籍的奏表，中云：

晋咸和初，苏峻作乱，书籍焚烧。此后起咸和三年，以至乎宋，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而尚书上省库籍，唯有宋元嘉中以来，以为宜检之日，即事所须故也。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既不系寻检，主者不复经怀，狗牵鼠啮，雨湿沾烂，解散于地，又无扁滕。此籍精详，实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sup>19)</sup>

这段话中保存信息甚多。其一，东晋以来的官方户籍一直保存着，梁武帝时代依然如此。其二，官方户籍的记载非常详实，并非简略敷衍。据郑欣(1933~2010)研究，东晋为南方土著居民建立了“黄籍”，黄籍上要详细登记户内成员姓名、家庭地位、年龄、死、病、逃亡、在役、远祖自本身的官职、通婚情况、门第等级、荫户等信息<sup>20)</sup>。其三，晋代户籍虽然在宋初被冷落了一段时间，但到了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据唐长孺(1911~1994)研究，为了征发寒门庶族的子弟从军，要严核士、庶之别，又重新整理“晋籍”<sup>21)</sup>。

18)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40页。

19) [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59页。按：《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也引用了沈约此文，但系节引，删削三分之二的文字，所以引用《通典》较宜。

20) 郑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和户籍制度》，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第2版，第213-216页。

21)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中华书

这些谱牒和“晋籍”中，自然有陶氏的谱籍。《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共引用〈陶侃别传〉两次<sup>22)</sup>，引用〈陶氏叙〉一次<sup>23)</sup>。可知梁代刘孝标(463~521)所亲见的至少有家传类的〈陶侃别传〉和族谱类的《陶氏谱》<sup>24)</sup>。朝廷中当有更多刘氏所未见的陶氏谱牒。当时谱牒的格式，据陈爽研究，世系一般追溯到曾祖，少数追溯显赫的远祖，会详细记录家族成员的官爵，母系外家的郡望和母亲父祖的职官也会详细记录，婚姻关系也会详录<sup>25)</sup>。陶氏家谱、族谱自然不会例外。如果这类谱牒是《宋书》的史源，说陶侃是陶渊明曾祖父其依据就源自《陶氏谱》这类谱牒，那我们对陶渊明的族属就不该轻疑。

贾弼的《十八州士族谱》和朝廷所藏的公私谱牒当然是《宋书》编撰所依据的基本史料。《宋书》的编纂，并非成于沈约一人之手，而是早在宋文帝时就已开始。《宋书·徐爰传》载：

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sup>26)</sup>

可知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394~475)受命在之前何承天(340~447)、山谦之(?~454)、苏宝生(?~458)的基础上，完成一部国史。沈约只用了区区一年的时间撰成一百卷的《宋书》，正是得力于徐爰所撰国史。沈约在《宋书·自序》中对此有详述：

---

局，2011，第127页。

22)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卷上〈方正〉、下卷上〈贤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327、691页。

23) 《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上〈言语〉，第107页。

24) 一般谱牒都有序，见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111页。

25)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110-114页。

26) [梁]沈约，《宋书》卷九四〈恩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八册，第230 8页。

(永明)五年春,又被敕撰《宋书》。六年二月毕功,表上之。<sup>27)</sup>

又说:

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篇牋未广。其所撰志,唯《天文》,《律历》,自此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谦之,孝建初,又被诏撰述,寻值病亡,仍使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爱踵成前作。爱因何、苏所述,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讫于大明之末。至于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来,至于禅让,十余年内,阙而不续,一代典文,始末未举。(中略)臣以谨更创立,制成新史,始自义熙肇号,终于升明三年。<sup>28)</sup>

考《宋书·何承天传》,承天于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sup>29)</sup>,这是《宋书》编撰的起点。徐爱撰作,时间下限到大明末。沈约的工作就是修订前面的部分,补写后面的部分。前引钱大昕所说的“沈休文撰《宋史》,在齐武帝之世,亲见谱牒,故于本传书之”,看来还不够准确,当修正。

推测起来,《宋书·隐逸传》中的陶潜传正是出自何、徐诸人之手,而非沈约所撰。《隐逸传》正传部分共十七人:最后一个关康之卒于顺帝昇明元年(477),其传应出于沈约之手;倒数第二人王素卒于孝武帝大明七年(463),撰人在徐爱、沈约两可之间;其余十五人,卒年都在元嘉和孝武帝初的孝建年间,自当出自何、山、苏、徐诸人之手。

既然朝廷中藏有公私谱籍,那么诸人撰著国史,自然要加以利用,至少族属问题在当时属于头等大事,不容出错。而且沈约后来修订补撰之时,这些谱籍依旧好好保存在政府中,他如有疑问,也会调阅参考。《梁书·沈约传》载约所著不但有《宋书》,还有“《晋书》百一十卷”<sup>30)</sup>,那他正该利用

27) 沈约,《宋书》卷一百,第八册第2466页。

28) 沈约,《宋书》卷一百,第八册第2467页。

29) 沈约,《宋书》卷六四,第六册第1704页。

30) [唐]姚思廉,《梁书》卷十三《沈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一册,第243

过这批“晋籍”。如今天学者的研究，这些谱籍记录的信息相当详细，族属一般不会有问题。现在《宋书·陶潜传》对陶渊明的族属的记载，自然是被沈约认可的，正不可轻疑。后来萧统写《陶渊明传》时，侯景之乱还未发生，朝廷保存的谱籍好好地存放在秘书监和尚书省中，他也是可以看到的。根据史源看，其实不但族属问题较为可信，就是寿数问题，也以信从《宋书》为宜。作为辅证，我们看丁福林《宋书校议》，其中指出《宋书》记载某人族属有误的情形一例也无；卒年有疑的不超过十例，也大多是二与三、三与四(三)之类形近之讹。前贤所提出的陶渊明五十二岁、五十六岁、五十九岁、七十六岁诸说，在字形上与“六十三”无一相似，这样的错误是很奇怪的。

### III. 职官制度的考察

陶渊明是否为陶侃后人，在其时的九品中正制下，他的品第如何，这是两个有关联的问题。陶侃虽然是南人，又是武将，因而见轻于北来士族，但他年轻时即获上品，后来更贵为长沙郡公，其后人在九品中正制中当获得一相当的品第。反之，设若陶渊明不是陶侃后人，只是普通的南方寒素子弟，那么他的品第必然很低，衡诸当时官制，他一般只能由县里小官起家，而不可能得到较高品级的起家官。

陶渊明所有的传记都称他“起为州祭酒”，即他的起家官是江州祭酒从事，这一事实是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和关键。州祭酒从事品级是高还是低呢？这大概是一个七品的官职，对寒门子弟来说，起家就出任这样一个官职，直与神话无异。

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经过唐长孺、宫崎市定(1901~1995)等学者的开拓研究<sup>31)</sup>，以及后来学者的持续考掘，其面目已经较为清晰。与本文有

页。

31) 唐长孺, 〈九品中正制度试释〉,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日]宫崎市定著, 韩昇、刘建英译, 《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北

关的事实有二。其一，这个制度在建立的初期，中正品是对人物的德行品第，与其人的官品并无一定的对应关系<sup>32)</sup>。但相沿嬗递，人物的中正乡品逐渐和其官品生出对应关系。早期起家官的官品会比中正乡品的品第低四到五级，以低四级为常见。即如果乡品为二品，那起家官一般是六品官<sup>33)</sup>。其二，唐长孺发现，大概西晋后期起，中正品第，二品以上为上品，三品及以下即不受人尊重，而有寒素之别<sup>34)</sup>。而宫崎市定则进一步指出，东晋以后，乡品二品发生膨胀，“来自北方的流寓贵族和土著贵族的子弟，似乎一概授予乡品二品”<sup>35)</sup>。因为乡品膨胀，如果起家官得不到清要之职，很多贵族子弟宁愿接受七品的起家官，这是陶渊明时代常见的现象<sup>36)</sup>。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就是以上品起家的。《世说新语·贤媛》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曰：

侃母既截发供客，闻者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进之于张夔。羊晫亦简之。后晫为十郡中正，举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也。<sup>37)</sup>

陶侃虽然出身寒贱，但经过母子努力，终于得上品而出仕。这是他微贱时之事，到了陶侃晚年，早已官高爵显，他的家族子弟正该循例获上品，这似乎不当有疑问。推测起来，陶渊明应该也是乡品二品，起家七品。论证之前，需要事先说明有关史料的问题。学者都知道，西晋的职官制度承袭魏代，而东晋则有较大变化，下启南朝。但是《晋书·职官志》和《通典》卷三七〈晋官品表〉保存的是西晋初的官品制度，比如此时州府、军府僚属还未像

京：中华书局，2008。

32)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313-323页。

33)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66-72页。

34) 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05页。

35)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143页。

36) 同上注。

37)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下卷上〈贤媛〉，第689-690页。

东晋一样成为进入品级的官职，因此考察东晋官品，更多需要参考沿袭东晋官制的《宋书》以后诸书《百官志》和《通典》所载宋、齐、梁之官品。

先看江州祭酒从事的问题。后汉、蜀汉州僚属有从事祭酒，位在治中之下，议曹之上，“所以尊显物望，并不职事”<sup>38)</sup>。《晋书·职官志》未载此职，然东晋州僚佐有祭酒从事，如《梁书·羊侃传》谓其祖规在晋末刘裕任徐州刺史时，获“辟祭酒从事、大中正”<sup>39)</sup>，是其明证。《宋书·百官志》有祭酒从事史，次序在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之下，而在议曹从事史之上<sup>40)</sup>。这一职位，梁、陈承袭之。严耕望(1916~1996)据《隋书·百官志》和《通典》卷三七《梁官品表》考证，江州祭酒从事的官品在梁代属于流内十八班的第一班<sup>41)</sup>。据宫崎市定研究，梁代更定官品，将宋代六品以上官细分为十八级，是为流内十八班。另有流外七班，则是原来七品以下官<sup>42)</sup>。祭酒从事在梁代刚刚好属于流内官的末尾，那么它在晋宋对应的似乎是六品官。但是我们倾向认为它原来是七品，因位望较崇，所以梁代将其划入流内官。理由是陶渊明一生出任和被征召的官职，应该遵循从低到高的常例。他起家官是祭酒从事，再征主簿不就，中间镇军参军、建威参军，最后彭泽令——晋、宋时代，大县之令是六品官，中小县之令第七品——晚年朝廷征召他的是六品的著作郎。他出任参军在祭酒从事之后，在县令之前，则参军的品位至低当与祭酒从事相同，至高则与县令相同。宫崎市定指出，“东晋以后，政治上的显著特点，是地方军府的发达”<sup>43)</sup>，军府中僚属的地位也相应提高不少。《宋书·百官志》中记载了东晋末有五种参军：正参军、板正参军、行参军、板行参军和长兼行参军。名称中的“板”是“府板”的简称，即由开府的大员、将

38)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4页。引文见于后者。

39) 《梁书》卷三九，第557页。

40) 《宋书》卷四十，第1257页。

41)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408页。

42)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190-194页。

43)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132页。

军自己征召的意思。除了府板，据《宋书》，还有一类参军是“除拜”的，即由中央政府任命的<sup>44)</sup>。从来源看，早期参军都由朝廷任命，正如西晋孙楚对石苞所言：“天子命我参卿军事。”<sup>45)</sup>其地位本自不低，至东晋，则当更高。宫崎市定说：“这些参军的地位如何，难以一概而论，但它决不像《通典·魏晋官品表》所示限于七品、八品的框架之内。参军的职务，恰似中央的尚书郎，故其地位大概准此。”<sup>46)</sup>尚书郎是六品官，参军之高者大概也是六品，低者也当七品。如东晋初孙盛，“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太守陶侃请为参军。庾亮代侃，引为征西主簿，转参军。”<sup>47)</sup>浏阳属于长沙郡，陶侃并未做过长沙太守，或者是其龙骧将军、武昌太守时事，又或者是宁远将军、荆州刺史时事，总之原文必有误。晋代官员在同品但重要性不同的官位上数度平转是常见现象<sup>48)</sup>，浏阳令是七品，那么陶侃的参军应该也是七品。再迁征西将军庾亮的主簿，再转参军，已是两次升迁，那么第二次的征西将军参军恐怕相当于六品，即便仍是七品，其实职地位一定更高，但是详情已不得而知。陶渊明与之相似，循州祭酒——主簿——参军的迁转之途。以参军的品位和《梁官品表》参照比较，那么州祭酒相当于七品官的可能性最大。

下面再取较典型的数人做一比较，可以帮助佐证前面的推测。首先是周虓，他的家世与仕宦经历与陶渊明最为类似。周虓是周访五世孙。周访是陶侃乡亲，同为寻阳人；其家世相仿，同为东吴将军之子，入晋后堕入寒族；出身相似，陶为督邮，周为县功曹；二人交好，“相与结友，以女妻侃子瞻”<sup>49)</sup>；战功相埒，访官至安南将军、持节、督梁州诸军、梁州刺史<sup>50)</sup>。《晋书》周氏本传云：“初，访少时遇善相者庐江陈训，谓访与陶侃曰：‘二君皆位

44) 《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第1224页。

45) [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六〈孙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2页。

46)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139页。

47) 《晋书》卷八二〈孙盛传〉，第2147-2148页。

48)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125页。

49) 《晋书》卷五八〈周访传〉，第1579页。

50) 同上注，第1581页。

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寿，周当下寿，优劣更由年耳。’<sup>51)</sup>陶渊明诗〈与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应即周访家族墓地。访长子抚，镇西将军、督梁州之汉中巴西梓潼阴平四郡军事、益州刺史、假节；抚子楚，监梁益二州、假节，袭爵建城公；楚子琮，梁州刺史、建武将军，领西戎校尉；琮即琨子，其家世镇梁、益，为东晋上游屏藩，琨之乡品自然不当有异于一般贵族的二品。而琨本传云：“少有节操，州召为祭酒。”<sup>52)</sup>足见州祭酒可以作为地方豪族的起家官。反之也证明陶渊明当有与周琨相似的家世与乡品。

其他世族子弟起家州之僚佐官的例子，如谯国桓彝，“早获盛名”，“起家州主簿”；会稽虞潭，“州辟从事、主簿”；王献之，“起家州主簿”；再如王导孙珉、吴郡顾众，初亦不过辟州主簿，二人虽不行，同可征州僚佐非不可施之一等世家子弟<sup>53)</sup>。

反之，东晋时真正的南方寒素子弟，初任职是不大可能担任州之高级僚佐的。比如长沙浏阳人易雄，“少为县吏，自念卑贱，无由自达，乃脱幘挂县门而去。因习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结豪右，州里稍称之，仕郡为主簿”<sup>54)</sup>。桂阳耒阳人罗含，父祖并为太守，然家非世族，所以初职仅仅是州将主簿，“后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为部江夏从事”，受谢尚之荐，“寻转州主簿”，而最后官至散骑常侍、侍中，转廷尉、长沙相<sup>55)</sup>。将易雄、罗含曲折的升迁对照陶渊明的“起为州祭酒”，其间品第高下就一目了然了。

根据以上分析和对比，我们可以认为陶渊明比照地方豪族子弟，获得了乡品二品、起家七品的优待。那么他是不是陶侃后人呢，答案不言自明。李详(1858~1931)曾批评后人说陶“刻意求胜”，“序昭穆，则又言非侃后。聚讼

51) 同上注，第1582页。

52) 《晋书》卷五八〈周抚传〉，第1582-1583页。〈周楚传〉，第1583页。〈周琮传〉，第1584页。〈周琨传〉，第1584页。

53) 《晋书》卷七四〈桓彝传〉，第1939页。卷七六〈虞潭传〉，第2013页。卷八十〈王献之传〉，第2105页。卷六五〈王珉传〉，第1758页。卷七六〈顾众传〉，第2015页。

54) 《晋书》卷八九〈易雄传〉，第2314页。

55) 《晋书》卷九二〈罗含传〉，第2403页。

纷纭，皆以意造”<sup>56</sup>。看来的确如此。又今人对陶渊明家世最常见的考语就是他出生于没落贵族，已经衰落到底层云云，恐怕未必妥当。穷归穷，但陶家在江州的豪族地位似乎仍旧保持着。

陶渊明的品第也许跟他的从祖陶范也有关系。据吴廷燮(1865~1947)《东晋方镇年表》，陶范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至太元六年(381)任江州刺史<sup>57</sup>。陶侃诸子中，“范最知名”<sup>58</sup>，所以《世说新语》里也颇有他的逸事。他到任刺史时，陶渊明十五至十七岁，大概正是州中正给予乡品的年龄，因为很多贵族子弟十八九岁就出仕为官了。如果陶渊明正好在这时得到二品的品第，那是一点不奇怪的。

#### IV. 结语

陶渊明是否陶侃曾孙，这当然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同时，之前的陶渊明研究中，很多学者因为陶渊明终身穷困，就说他出身寒微，或者说他出身没落的地主家庭云云。如果不纠缠于一二文句的解读，而是衡诸文献史料的史源和当时的职官制度，就可以清楚发现这些质疑不能成立，判断也不准确。也就是说，史料所载应与其历史语境相符合，研究者提出的新说如果经不起历史语境的审查，那这些新说就是无效的。对史料无论疑还是信，都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确认史传中陶渊明的家族、世系等记载可信之后，再来审读颜延之《陶徵士诔》“韬此洪族，蔑彼名级”和《五柳先生传》中“不慕荣利”之语，以及他二十九岁才出仕的行为，可以知道陶渊明是真的不在乎，真的不想要。以其家族的地位和自身的乡品，他要做官，一早就可以。那种因为“没落”了做不到

56) 李详，《陶集说略序》，《李审言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12页。

57) [清]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3486页。

58) 《晋书》卷六六，第1781页。

官，说几句狐狸遥望葡萄的酸话的行为，绝非五柳先生所为。

不妨顺带对〈五柳先生传〉写作时间的问题补充几句。《宋书》以来的旧说认为此文做于早年，不少当代学者则持晚年说。魏耕原《陶渊明论》可谓“晚年说”的集大成者，读者可以参看<sup>59)</sup>。学者则在考证陶渊明晚年好松，而有庭园中种松的任诞之举后，认为一个人不大可能同时将人格精神寄托于几种植物之上，既然晚年所好在坚凝之松，那么对柔弱风流的柳的喜好在其早年比较合适<sup>60)</sup>。现在再从乡品和出仕的角度来想想，陶渊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自传”。正如钱锺书(1910~1998)所说：“‘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老子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船山遗书》第六三册《思问录》内篇)。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sup>61)</sup>一海知义同样指出，“先生不知何许人也”这样的开头，来自《列仙传》、《高士传》这类神仙、隐士的传记传统，反映的陶渊明的心理是“什么家世、出身，狗屁不值”<sup>62)</sup>。如果是晚年所作，隐居既久，为什么还要纠缠在家世问题上呢？也许理解为在获得州中正的乡品之后，陶渊明作此文示人以不仕之意，更为合情合理。所以《宋书》本传说：“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sup>63)</sup>即时人对他不出仕的行为表示认可。

### 〈参考文献〉

1.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

59) 魏耕原，《陶渊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3-254页。

60) 刘奕，〈五柳与孤松——陶渊明的文化偶像与魏晋风度〉，《文与哲》，第27期，2015年12月，第103-123页。

61) 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第1228-1229页。

62) [日]一海知义著，彭佳红译，《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23页。

63) 《宋书》卷九三，第2287页。

2. 杜佑撰, 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 《通典》,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年.
3. 房玄龄, 《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 郭锋, 〈晋唐时期的谱牒修撰〉,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1期, 1995.
5. 洪亮吉, 《晓读书斋杂录》, 《续修四库全书》, 第1155册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道光22年(1842) 刻本影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6. 一海知义著, 彭佳红译, 《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7. 刘义庆撰, 刘孝标注, 余嘉锡笺疏, 《世说新语笺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8. 刘奕, 〈五柳与孤松——陶渊明的文化偶像与魏晋风度〉, 《文与哲》 第27期, 2015.
9. 李详, 《李审言文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10. 李延寿, 《南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1. 宫崎市定著, 韩昇、刘建英译, 《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2.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3.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 陈文和主编, 《嘉定钱大昕全集》, (增订本) 第9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6.
14. 钱锺书, 《管锥编》(第2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5. 沈约, 《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6.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7.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8. 魏耕原, 《陶渊明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9. 吴士鉴, 《晋书斟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0. 吴廷燮, 《东晋方镇年表》, 《二十五史补编》 第三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21. 萧子显, 《南齐书》(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22. 阎步克,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23. 严耕望,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4. 严耕望,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5. 姚思廉, 《梁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26. 郑樵撰, 王树民点校, 《通志二十略》,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27. 郑欣, 《魏晋南北朝史探索》,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2版.
28. 周一良,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9. 朱自清, 《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 《朱自清全集》第八卷,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 Abstract >

The early historical records all recorded that Tao Yuanming was Tao Kan's great-grandson. So as a member of gentry class, Tao Yuanming can obtain the higher official rank in the nine grades of rank.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who suggested that Tao Yuanming was not the descendants of Tao Kan. Their main basis was a controversial poem of "For the Lord of Changsha" 赠长沙公族祖. In fact, as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record of Tao Yuanming, "Song Shu" 宋书 was compiled according to the genealogies of the gentries at that time. This fact means that the genealogies records in Song Shu were reliabl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hasty suspicion. At the same time, Tao Yuanming, as the descendant of Tao Kan, Tao Yuanming should obtain a official rank in the nine grades of rank in accordance with his family identity.

Combined with the official system to examine Tao Yuanming's official career, we can confirm that he Origin gentry. The old idea that he was born humble was inaccurate.

Key Words : 陶渊明(Tao Yuanming), 家世(Extraction), 品第(Official rank), 史源(The source of history), 官制(Official system)

